

## 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李慎之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现在为罗荣渠教授的《美洲史论》作序的时候，他已经是古人了。

第一次见到荣渠是 1991 年在大连召开的一次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的拉丁美洲史学会上，他给我的印象是立论正大，思路缜密，是一个难得的学者。订交以后，我们也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在广州召开的中美关系史学会上，当时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溜会去参拜久已慕名的南宗六祖的道场光孝寺与六榕寺，我知道他兴趣广泛，相约同行，回来几乎误了晚上的宴会。我与他的交情真可谓以会议始，以会议终了。在我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个慷慨豪爽，童心未泯，而且生龙活虎的人。我比他痴长几岁，他视我为兄长，而竟会先我而去，真是世事难料，出乎意料的事情。今年 6 月，我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在坎布里奇作访问研究。有一天，北京大学的刘文澜同志因为要找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来到我的寓所，闲谈中，我提到“你们的罗荣渠教授是研究现代化的一把好手”不料她的反应竟是“他已经

本文系李慎之先生为罗荣渠著《美洲史论》一书所作的“序”，收入本书时题目略作改动。

过去了”。我一时惊呆，久久说不出话来。直到我 8 月份回国以后才看到他的讣告，知道他是以大面积心肌梗死，猝然病发，来不及救治而死的。

荣渠活了 69 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以虚岁计算，正合杜甫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之年，说起来也不算短命了，但是按近年来的实际，以他的精力，再多活个十年廿年，也并不稀罕，何况他的学术生命刚刚因为改革开放而进入新阶段。仅从这本《美洲史论》所显示出来的轨迹看下去，他实在应该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有更多的贡献。出国以前，今年 1 月，我还看到他《20 世纪回顾与 21 世纪前瞻》一文；今年 2 月，我又看到他《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文。虽然荣渠自己很明白预言历史是近乎办不到的，但是这又是负有创造历史的天职的人类不得不做的工作。这样的文章，在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写得出来的。然而天不假年，遽然撒手，这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的悲哀，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悲哀。

荣渠是在极左路线的时代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从荣渠的遗作看，转折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以 70 年代底为分界线，前 30 年的国家目标是世界革命，后 20 年的国家目标是现代化。荣渠是我国有数的专门研究美国和美洲的史学家，他前半期的著作主要是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后半期的著作则主要是讨论中国实现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志趣判然有别。但是，尽管如此，荣渠的学风还是与众不同。即使是在前期，他的文章也无不是论证细密，反复质难，看得出他对理性的要求显著地高出流辈，这一点只要一读《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这样的论文就可以了然。它与当时那些高腔大调、一唯以气取胜、以势压人的文章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历来相信，不管“哪一种理论”，只要你真正“坚信”它，坚持不懈地与事实对照，与其本身的逻辑对照，与自己的良知对

照，有求是之心而无自欺之意，最后必然能凭借“人”所固有的内在理性的强大逻辑而接近真理。可以想象，荣渠在他锲而不舍、广征博采的追求中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开放改革之初的 1980 年，荣渠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已经批评了我们过去对美国研究的“狭隘”与“缺乏系统性”，他提出，“美国要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国”。他质问，为什么日本与西方接触而强盛，中国与西方接触而败落？他主张应该继续走百年前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开辟的道路，学习“两百年来美国所以发展如此迅速”的经验。他的学生杨玉圣把这篇文章称作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实在并非虚誉。

就在这篇文章中，荣渠还提到“过去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一般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世界而很少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这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一定的局限，甚至难免不自觉地受到闭关自守的因袭观点的影响。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好一个“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荣渠一定是深深感到了几十年来的斗争哲学对中国学术界造成的伤害才说这番话的，然而真正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谈何容易，如果能够以一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转变就很不错了，这当然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也是全世界，首先是主要大国的事情。如果能这样，这将是人类之福。

从那时起，荣渠的研究道路有了重大的转变，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主任了。他送了我一本书，是他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如其副标题所说，这是《五四以来有关中国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这本书资料搜罗宏富而精炼，是一本十分有用的书。它使我惊讶地看到，我们今天争论的许多问题其实在三、四十年代都已经提出来了，然而苦命的中国却竟还要在几十年之后反复讨论同

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能看到荣渠写的《现代化新论》，现在要为他写的《美洲史论》急就章式地作序，也已经来不及补课，但是我相信他必有平实深入之论。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收入本书的许多文章都可以看出一个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希望找到中国的病根，治愈中国的痼疾，使中国顺顺利利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迫切心情，就是明证。

特别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本书中讨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说”的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大凡能懂得“发现”这个词儿的意义的人，也就会懂得这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如果“发现”可以不要以世界史为参考系，那么美洲本来就是印第安人发现的，还有什么别的可说呢？然而妄人倡说于前，愚众起哄于后，虽然多年以前，胡适就已痛斥其非，不过那还只是一个史学权威出于常识而发的义愤，而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批驳，应当说已经一言定讞，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真是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清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慎之案：在1957年以后，我已再不可能见到邓拓同志，但是我始终认为，博学明辨如他，1961年以马南邨的笔名在《燕山夜话》上发表的“慧深发现墨西哥说”只是想使当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极度紧张与压抑状态的中国人轻松一下。）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读者推荐的一篇文章是《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一篇考证文章，其实是一篇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荣渠通过从地理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考核名物到穷研心理……详征博引，条分缕析，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中国人固然以考证见长，但是像这样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还实在并不多见。我们要继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史学传统，就要能写出这样的著

作来。

哥伦布不论其个人品德如何，才力如何，总之是历史选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天命选定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从他远航美洲开始（可怜他到死也不知道他到底到了什么地方，有了什么样的发现，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人类就开始了全球化的时代。人类 *Homo sapiens*）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以后，出于求生的欲望，在世界各地辗转流徙，在极其不同的地理气候与生活环境中形成了大小不同的语言、文化以至肤色、体质都各不相同的族群，尽管彼此间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始终不断，但是直到 1492 年才发生了可以称为全球性的大会合。以后发生的地理大发现、商业大革命，以至工业化、现代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统以此为动力和条件。识力超群的梁启超就看到哥伦布是使“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的人物。但是哥伦布也成了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老祖宗，当然要因此而受到诟病与攻击。只是，西方中心主义尽管可以由于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如改变成东方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甚至多元主义即无中心主义，或者如熊十力解《周易》以“群龙无首，吉”为极致，均无不可，全看历史如何发展而定），但是，梁启超所谓西方“以动力横绝天下”五百年的历史事实却是超乎价值判断之上而不可能改变的。哥伦布开始了全球化的时代，但是只是到第一个五百年结束、第二个五百年开始的时候，全球化的概念才真正进入人类的意识，全球化是祸是福，正在开始引起全人类的注意。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我特别痛感中国有大视野、大魄力又有实实在在的学力的学者的稀少与可贵。

仔细披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的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为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

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界感到深深的悲痛。

荣渠执教北京大学凡 40 年，培养了一些学生，我希望他们能继承他们的老师的志业，真正做到薪尽火传。但愿我的希望不会止于希望。

1996 年 12 月 24 日 耶诞前夜

（李慎之，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章开沅

本文是我为《中国史学年鉴》撰写的一篇特稿，现提供作为对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前驱者荣渠兄的致敬与追思。

——作者附识

中国大陆历史学者正式参与现代化研究，是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首先承担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此项课题的有两家：一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课题名称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罗荣渠主持；一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课题名称是“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章开沅主持。北大课题的主要参与者是世界近现代史学者，华中师大课题的主要参与者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前者由世界看中国，后者由中国看世界，正好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

经过将近十年的努力，两个课题组的工作都有明显的进展。

北大课题组以后正式建立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已出《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著）、《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

索》、《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亨廷顿等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筹书 并且于 1994 年 11 月举办“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们在介绍、评论国外现代化各派理论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现代化新论》一书可以看作是这 10 年辛勤耕耘的总结。

华中师大课题组也编辑出版了《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 已出《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章开沅著)《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罗福惠著)《西学东渐与自由意识》(易升运著)《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唐文权著)《东方的复兴——中印经济近代化对比观照》(范铁城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严昌洪著)《折断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赵军著 筹书 而作为其阶段性总结成果则是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层面重新给以探讨。华中师大也曾在 1987 年 5 月举办“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除了上述两个课题组以外 还有许多历史学者 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也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参与现代化研究,本文不拟一一胪列。

需要指出,台湾中国近现代史学者早在 1973 年即已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的集体研究计划 由李国祁、张朋园主持。课题分工如下:1. 王萍 广东;2. 李国祁 闽、浙、台;3. 王树槐 江苏;4. 陈三井 上海;5. 张朋园 湖南;6. 苏云峰 湖北;7. 吕实强 四川;8. 张玉法 山东;9. 林明德 直隶;10. 赵中孚: 奉、吉、黑。该计划已于 1977 年结束 有关专著大多早已出版 部分上述学者现正转向内陆或边远省区研究,如张朋园现正从事云贵

地区现代化研究等。台湾学者亦曾举办过多次中国现代化研究学术讨论会，显示出在现代化区域研究方面所已取得的显著成绩。

平心而论，历史学家并非是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在这个领域他们曾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后继者。但历史学家并非消极地追随与附和，他们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历史研究方法投入现代化研究，并且根据历史学自身的特点推进多学科的综合。因此，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展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际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

从学科分工而言，历史学家虽然侧重研究过去，然而决不可以理解为冷漠现实。司马迁早就说过“史学家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我的理解没有背离原意，那么这句话也可以改从反面讲，即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能或至少难以成一家之言。关键是要在古今之间寻求一个通字。用现代语言来说，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所谓“以史为鉴，读史益智”，“云云都不能离开这个重要前提。我不太喜欢孟浩然《与诸子登岷山》那首诗，因为它未脱‘发思古之幽情’的老套，但我却常引用其中两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因为这两句诗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感，而且还蕴含着对时空的某种超越。历史正是如此，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中国近现代史本来就是一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逐步走向现代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需要研究现代化问题可以说是责无旁贷。过去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曾经长期侧重于革命史和反帝斗争史，研究视野与覆盖面均较狭窄。现

代化研究开展以后，必然要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特别是工业与服务行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经济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或称行政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过去不甚重视，甚至完全没有研究的。近十年来，与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迅速进展相伴随，还有城市史研究、商会与绅商研究、学堂学生群体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留学运动史研究、大众传播媒体史研究、社会心态变迁史研究等等史学分支的崛起，这些都与历史学者对现代化研究的关注与投入有关，而这些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为中国现代化研究增添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因此，现代化研究的深入，可以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宽阔的空间。这种对话，不仅限于中国的过去与今天的纵向对话，而且还有中国与外国的横向对话；也只有经过这种种对话，古与今、中与外才能实现内在的融通。我们常常感叹社会不重视历史学科，然而首先却应反躬自问历史学科是否重视社会。我们常常又苦恼于史学危机，殊不知危机之中未尝不蕴含着转机。历史本身当然不能现代化，但是历史科学从方法到格局却必须走向现代化。早在本世纪初，章太炎即曾主张，中国通史首先应“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sup>①</sup>，不必以褒贬人物、胪述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 11 号）。史学只有通过革新才有新的转机，才有光辉的前途，我们现在在史学领域提倡并从事现代化研究，无非是继承与发展前贤未竟之业而已。我们相信，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加强现代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本学科的革新与发展，而且还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由于现代化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协合研究，历史学家在此项研究过程中，必然要与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专家对话。这样又必然会把其他学科的某些新起的理论及其方法，引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柯克洛夫特、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霍浦金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等。同时，由于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必然要以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参照，既包括自发型的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外铄型的后进亚非拉国家，这样又促成中国史学者与世界史学者之间的对话。我早曾有过一种想法，如果中国史学者花点力气研究世界史，世界史学者花点力气研究中国史，而且双方加强交流，一定可以相互补益，使我国史学呈现新的风貌。如今，通过近十年的现代化研究，这一设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角度的更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都预示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过去十年的现代化研究完美无缺。应该承认，由于客观的与主观的各种原因，我们对于此项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较差，资讯较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坐让外国学者代替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化。如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现代化》一书，在中国就出了两种中文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与江苏出版社），连他本人都曾对我说“受宠若惊”。我们理应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他们在学术视野与理论、方法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他们对国外资料、信息掌握较多，可以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但是他们毕竟是“局外人”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很难有完全真切的了解。即令博学如已故的比较史学家布莱克，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率先提出并探讨了国际整合模式（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国际认同（International Consensus）、国际行动基础（The Bases of International Action）等等全人类都关心的

整个世界现代化的前景诸问题，但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中国与日本、锡兰统统划为佛教国家，而且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相提并论。即此可见，其他某些外国二、三流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速成理论框架，往往纰漏更多，也更加经不住推敲。可能是由于封闭已久对国外史学状况了解不够加以长期“唯上”“唯书”的恶习窒碍着我国历史学者创造思维的挥洒，所以在近些年中国现代化研究过程中，理论探讨方面或多或少还存在着简单仿效西方的缺点。譬如一个时期有些人曾热衷于讨论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性，一个时期有些人又热衷于讨论清末民初中国有无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等等。据我所知这些热点都是从西方，甚至就是经由西方学者引进中国的。我并非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但认为不必过多地重复国外已经有过的争论。因为这些问题在西方的提出，无论是持肯定意见者还是持否定意见者，大多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即在不同程度上以英、法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模式为单一的原型。就是那些自认为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学者，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对中国现代化某些症结问题的议论，也难免有点隔靴搔痒。我丝毫无意于贬损西方学者，我一贯尊重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热诚与勤奋，但我认为我们自己毕竟不应该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勇于探索自己在研究中碰到的问题，并且勇于自己作出创造性的理论回答。

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布莱克把自己《现代化的动力》一书的副题叫作“比较史学的研究”就是这个缘故。他正是通过比较把 170 多个人类社会归纳为七种模式，研究并力图说明世界现代化进程及其结局。中国有句老话——“殊途同归”，它恰好可以用于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现代化的大目标与指标体系是相同的，至少是相近的；现代化的内容以及实现它的前提条件，确实也存在着许多共性。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并为之创造

前提条件的道路与方法，却又必然千差万别，具有各自特殊的个性。百余年来 我们的先辈和我们自己 老是在“以夏变夷”或是“以夷变夏”、“中体西用”或是“西体中用”乃至“全盘西化”这些老问题中兜圈子，其实更为重要的问题倒是寻求更为深层的现代化进程中 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因而便不应简单地用西欧或北美模式来衡量并套用于其他地区与国家。各个后起的而又迅速走向现代化（或可称之为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 例如所谓东亚“四小龙”通常也能提供自己的新模式与新经验，但这些模式与经验，也并非其他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所能简单、机械地搬用。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除了历史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机制不同以外，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的差异，乃至起步早晚与市场机遇的差异，都决定了每个国家和地区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依据自己的国（区）情与当前所面临的时空环境，来设计切合实际的现代化蓝图与实施方案。罗荣渠在其新著《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已经更为全面、深入地说明了这层道理。

在 80 年代 前一段时间曾流行所谓“中外比较热”而后来又曾被极少数人批评为“崇洋媚外”。其实 有些热衷比较与批评比较者，双方都未必理解比较研究的真谛，因而产生种种误导与随之而来的误解。因为，比较研究不同于简单的类比，最忌讳的是不合科学规范的随意性。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评判各国文明的优劣高下 而是通过比较来寻求世界各国 地区 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或称共相与殊相（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比较研究必须通过不同层次的共性与个性的发现，才能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六年以前 我在《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总序》一文中曾经说过：“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是一个难度极大而又工程浩繁的科研项目。而说到底，难就难在知己知彼。”因为共性与个性并不是轻易所能掀取的 只有在深刻认知己中 与彼外 的基础上 经过严肃认真

的科学比较才能发掘出来。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努力求得进一步的改进。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在 90 年代最初四年已有很大的进展，投入此项研究的学者愈来愈多，研究方法和研究条件已有明显的改善，质量较高的论著已经并正在不断问世。随着我国当代现代化建设的迅速进展，新的时代将对现代化研究提出更高的诉求，而现代化研究也必将在史学与现实两方面产生更为明显的积极影响。

（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 晚清对西方认识的几种新史料

王庆成

罗荣渠同志原来专攻美洲美国历史，与我并不同行。但从 80 年代初起，我们有了很多接近和讨论、切磋的机会，我由此而得到了许多帮助和教益。

记得那是 1982 年的初春 我应荣渠的夫人周颖如女士来信之约，去荣渠的家拜访他们。颖如和我是 50 年代的同事 又于 1958 年在一起下放劳动、参加社教。那是我初次认识荣渠 他告诉我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新近得“路斯基金会”资助，每年可邀请一名中国“杰出学者”，他们不大熟悉中国史学界 托他提一些名字 问我是否愿意被提名。荣渠刚从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研究一年回来，那里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心之一，而相距不远的密州大学，其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孔华润 (Warren Cohen) 是研究美国对华外交史的专家，与荣渠有不少共同兴趣，时相过从，因而把物色中国学者的事托给了荣渠。第二年我去了密州大学，不久我认识了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费维恺 (A. Feuerwerker)。一次他犹豫了一阵后问我 根据你的兴趣 你应该来我们这里 而你去了州立大学 为什么 我说 这是因为罗荣渠提名给孔华润 而你们没有叫我来呀！说完彼此大笑。以后孔华润、费维恺等成了荣渠和我的共同朋友。

荣渠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致力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取

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86年国家成立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各学科小组。我负责的中国近代史小组提出了对农村、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等等设想。荣渠的现代化研究课题也是那时开始的，他的课题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但范围更加广泛。他大概参加了世界史小组，课题是在那个小组确立的。这是当时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中国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对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理应被学术界所重视。但对这一重大问题，过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起步并取得成就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荣渠和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几年之内就陆续出版了至少五种极富学术价值的专书：《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1992）、《现代化新论》（1993）、《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1993）、《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的再探讨》（译文集，1993）还有多篇发表于重要报刊的论文。这些论著包括了广泛搜集研究前人、今人和海外的资料、成果，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作了比较研究。我相信，荣渠是七五规划课题完成最好者之一，他的成果在史学界是大放异彩的。

荣渠的著作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他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提出，现代化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进化、社会发展的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在形成唯物史观之初就已提出了现代化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经过列宁的阶段而有所丰富，而近来国际社会主义理论界都把改革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总结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探索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新路子，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他的这些看法十分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切合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实际。他对于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1949年以前）的研究有许多创见，如他研究晚清的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肯定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同时着重指出它的保守性，指出它是在原有

的王朝体制和结构中采取的修补性措施，其起点远低于同时期日本、俄国的早期现代化改革运动。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几个层次分析了制约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因素，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对社会变革的容纳能力、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启动、中国传统教育—文化体制对摄取外来科学技术，都是有局限的，有抵触的。荣渠的这些见解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有启发，很有指导意义。对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史，必须抛弃或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的非此即彼方法。像荣渠那样的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

在近代中国，西方国家的侵略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基本方面。编入上述《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中的一篇台湾学者的论文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一方面使中国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损伤了国家元气，一方面使中国经济不能独立，自己工商业站不住脚，又激起中国人仇洋、媚洋、羡洋等复杂而不正常的心理。这些都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很有道理的分析。当然，现代化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来看，当时的西方国家处在比中国高的社会阶段，因而在晚清的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习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是问题的另一面，这也就是学生先生而先生欺侮学生的矛盾关系。荣渠在对晚清从“御侮图强”到“中体西用”过程的论述中，对这种关系和“中体西用”的作用有很精到的分析。中体西用毕竟与完全固守中学不同，毕竟认识到了要用西学来补充中学。但是，学西方什么？从他对近百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期来看，他认为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先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继而在制度层面，然后在思想文化层面。这是很多学者的共同看法。概括地看，这是不错的。当然，社会人群因各自所处地位之不同，所受教育之差异，观察问题之角度，看法也难于一律，三个层面也不免会有交叉。下面我选择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几件小事，以说明在中国近代化伊始阶段人们对西方、对学习西方的不